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1, 2025, pp.114-123.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1.13>

《化身博士》中的身体政治和人工智能隐喻

李璇 (Li Xuan)

摘要: 罗伯特·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长期以来被视为探讨身份、自我与人格分裂的经典文本。然而，其中蕴含的身体政治与人工智能隐喻却未得到充分关注。本文探讨科学实践如何颠覆传统的身心统一性，塑造畸形的具身性。通过分析杰基尔博士的药物实验对身体的规训，预警当代具身智能发展中的权力挑战。海德对杰基尔的侵占与反噬，揭示了造物对造物者的主体性威胁，也映射出人工智能发展的困境。本文重新挖掘《化身博士》的当代价值，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主体性与身体界限问题提供新思考。

关键词: 《化身博士》；罗伯特·斯蒂文森；身体；人工智能；具身智能

作者简介: 李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小说。电邮：lixuan118108@163.com。

Title: Body Poli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aphors in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Abstract: Robert Stevenson's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1886)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classic text exploring identity, self, and the split personality. However, the body poli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aphors embedded within it have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Dr Jekyll's bodily transformation and discipline through drug experiments, exploring 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unity of mind and body and shape a deformed embodiment. It also serves as a warning for the new power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mbodied intelligence. By examining how Hyde encroaches upon and backlashes against Jekyll, it reveals the threat of human creations to subjectivity and the dilemm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re-explor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providing new avenues for thinking about subjectivity and bodily boundarie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Robert Stevenson; bod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bodied intelligence

Author Biography: Li Xuan,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Area: British Fiction. E-mail: lixuan118108@163.com.

引言

关于罗伯特·斯蒂文森（Robert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1886）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双重人格、心理分裂和身份等方面，身体政治与人工智能伦理的深刻隐喻却未得到充分挖掘。本文借鉴梅洛-庞蒂的具身理论和福柯的身体理论，重新审视杰基尔博士的药物实验如何颠覆传统的身心统一性，制造出一种畸形的、分裂的具身存在，进而预演了当代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主体性危机。在当代语境下，杰基尔的药剂与今天的算法监控系统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展现了福柯所警示的权力对身体的渗透与控制。小说中，杰基尔试图通过化学手段改造身体改造灵魂，却反被其造物海德吞噬，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技术对身体的客体化可能导致的异化后果，更隐喻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与造物之间潜在的主客倒置风险。通过分析杰基尔与海德的共生关系，本文探讨了科技造物如何威胁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并借此对当代具身智能技术的发展提出伦理警示：技术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持续反思之上，唯有在共生而非控制的关系中，科技与人性才能实现真正的辩证统一。

一、海德的身体：具身智能的失控

斯蒂文森在《化身博士》中通过海德畸形的身体形象，深刻揭示了 19 世纪社会对非常态身体的偏见与排斥。海德初次登场时，其身体就引发周围人本能的厌恶：“他相貌上有种很怪的东西，有一种叫人不快，叫人厌恶甚至害怕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讨厌一个人达到如此程度，但我说不出什么原因。他该是什么地方有点畸形吧，他给人一种强烈的畸形感”（斯蒂文森, 2015, p.7）。这种排斥反应体现了福柯所论述的“不正常的人”的社会建构：“畸形的本质是混合（福柯, 2003, p. 66），畸形是把不可能和不被允许的东西结合起来的综合体”（斯蒂文森, 2015, p. 58-59）。海德身上的善恶两种人格，在某种程度上看，也可被视为一种畸形。小说还刻意保持海德畸形特质的模糊性：“海德脸色苍白，身材矮小，给人一种畸形的印象，但又叫人说不出畸在何处”（斯蒂文森, 2015, p. 15）。这种“无可名状的厌恶、憎恨和恐怖”（斯蒂文森, 2015, p. 15）恰恰符合福柯对“需要改造的人”的特征描述：“人们不能证明这个人是无药可救的。他恰好处于无法确定的边界。人们不能对他提出证据，也不能提出证明。是含糊不清的”（福

柯, 2003, p. 61)。福柯还认为“界定需要改造的个人的东西, 也就是他是无法改造的”(福柯, 2003, p. 61-62)。而杰基尔认为自己拥有无法改造的灵魂: “我早就明白我是无法改造, 也无法改善的一个不调和的混合体了”(斯蒂文森, 2015, p.70)。

身体具身性理论为解读这种身心关联提供了哲学框架。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 指出“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一般媒介”(2002, p. 195), 认知始终基于具身体验。具身性 (embodiment) 强调身体与心灵的不可分离, 意识和存在感深深扎根于身体的物理体验中。小说中海德的畸形身体被自动等同于道德的缺陷和邪恶的灵魂: “是一个丑恶灵魂的光从里面透出来, 使包裹灵魂的肉体发生了变化”(斯蒂文森, 2015, p. 15)。“这位绅士身上有点奇怪的东西——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你简直会觉得你的骨髓都在发凉, 发毛”(斯蒂文森, 2015, p. 49)。这种直觉判断反映了 19 世纪将身体作为道德载体的认知模式。具身性的动态特征在此呈现悲剧性反转——当杰基尔试图通过科学手段实现“身体的精神化”, 反而导致具身性的瓦解。梅洛-庞蒂的具身性强调身体的物理体验如何影响并成为人类认知、情感和社会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为“我就是我的身体”(Merleau-Ponty, 2002, p. 202), 经验主体“我”与身体之间没有本体上的分离。身体的主观性在灵魂的具现和身体的精神化的双重过程中发展, 结束了身体的二元对立, 身体与心灵的结合在身体中统一并存在。梅洛-庞蒂恢复了身体的完整性, 建立了“物质性”(materiality)这一概念, 并提出身体超越了物理器官和欲望, 身体的物质性和具身性使身体成为感知和体验世界的场所。“物质性”不仅支撑我们的身体, 还支撑我们的灵魂和思想, 以及身体所存在的环境(张金凤, 2019, p. 58)。然而, 杰基尔的科学实验将身体的物质性消解, 对具身基础的否定最终引发存在危机。杰基尔最初将药物造成的人格分裂视为解放: “在这新奇感中我体会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幸福。我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身体轻快多了, 精神上也更愉快了。一切义务感的束缚都不在了”(斯蒂文森, 2015, p. 68)。然而, 他很快发现具身异化带来的存在困境: “自己已变得十分邪恶, 十倍地邪恶, 好像已经把自己卖身为奴, 奉献给了我的恶德”(斯蒂文森, 2015, p. 68)。这种分裂最终导致他彻底的自我异化: “我一想起他就恶心, 就浑身打冷战...从来没人受到过我这样的磨难和痛苦”(斯蒂文森, 2015, p. 81)。当具身统一性被破坏后, 主体性走向崩溃。杰基尔最后的忏悔揭示了这个过程的不可逆性: “我不仅认识到自然赋予我的肉体只是构成心灵的那些力量所发出的气味或光辉, 而且我成功地配成了一种药剂, 用它可以把这些力量从至高无上的皇座上废黜下来”(斯蒂文森, 2015, p. 67)。小说通过这个科学怪人的寓言, 不仅批判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身体观念, 更前瞻性地揭示了具身性对于主体建构的根本意义。

具身性是基于个体的经验, 这种体验是独特的、情境化的, 有差异的, 常常与社会规范存在张力, 以复杂的方式参与社会建构。在《化身博士》中, 具身性与文化规范之间的张力通过杰基尔/海德的双重存在得到了深刻体现。杰基尔的科学实验加剧了身体与心灵的分裂, 实验认为改变相貌即可改造灵魂, 忽视了身体与社会的复杂耦合关系。

真正的身份认同需要维持适度的身体连续性作为存在的根基。杰基尔博士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体面的上层社会绅士，其公开形象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但这种符合是以压抑其具身经验为代价的——他必须严格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海德的诞生正是这种被压抑的具身经验的极端爆发，代表了个体化、非规范的具身体验与主流文化规范之间的剧烈冲突。杰基尔博士长期以来处于表里不一的状态，这种表里不一实则是身体表面和灵魂的分裂，是身体具身性的毁灭：“我时刻隐藏着追求快乐的欲望。当我长大到了能够思考的年龄，我开始观察周围世界，并且估量我在这世界上的前程和地位。此时，我已被紧紧束缚于极端的双重性格之中...在每个人身上，善与恶互相分离，又同时合成一个人的双重特征”（斯蒂文森, 2015, p. 65）。杰基尔对外是获得了世俗上成功的有名医生，但内心一直希望改变单调乏味的生活，通过科学实验创造出与他不一样的灵魂的肉体。他自身外表与心灵的分裂造成了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妄图改变自己的身份的对外表现形式，以寻求认同和自我。海德形象所呈现的“畸形”特质实际上是对维多利亚时代身体规训的颠覆。个人经验与文化规范之间的互动突显了具身性与身体之间的张力：“由于具身性是个体化的表达，因此它与霸权文化构建之间至少存在一种初步的张力”（Hayles, 1999, p. 197）。小说中旁观者对海德的本能厌恶恰恰反映了社会对不符合规范之具身经验的恐惧与排斥。这种反应不是基于海德实际做了什么，而是他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文化规范的威胁。杰基尔试图通过科学手段解决这种张力，结果却导致具身经验（海德）完全失控，最终吞噬了规范化的自我。杰基尔的悲剧在于，他将身体视为可以随意改造的客体，而非主体存在的根基，试图通过技术手段（药剂）来调解这种张力，而不是承认和接纳具身经验的正当性。这一过程展现了当个体试图完全否认或压制其具身性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时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杰基尔的灾难也揭示出了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潜在危机。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概念与人类具身性形成了一种呼应。具身智能理论自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以来，代表着对传统人工智能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质疑。传统方法将智能视为纯粹的抽象符号处理过程，其核心在于算法或程序——即所谓的“软件”，而不关注运行这些算法的硬件（身体或大脑）（Pfeifer & Bongard, 2007, p. 27）。具身智能则否定了将智能简化为抽象符号处理的认知模式，转而强调物理身体在智能行为中的基础性作用。具身性不止是为智能配备物理载体，它要求从根本上重构设计思维，将身体形态、感知能力和运动控制视为智能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身”这一概念不仅意味着智能体必须拥有一个身体...它还意味着在构建机器人或通用智能体时，应该遵循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Pfeifer & Bongard, 2007, p. 29）。“具身智能”使人工智能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互动，试图模拟人类的感知与行动能力（Pfeifer & Bongard, 2007, p. 37）。这种转向不仅意味着技术路径的改变，更隐含着对智能本质的重新理解。这种认识与梅洛-庞蒂关于“身体主体”的现象学洞见不谋而合，都强调认知过程与身体经验的不可分割性。

然而，人工智能的具身化转向也带来了新的困境。具身智能的发展引发了关于技术异化的深层思考。在传统的人机交互范式中，技术工具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具身智能系统由于其自主行动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可能发展出超出设计预期的行为模式。这种可能性在《化身博士》中已得到文学化的展现：海德不仅获得了独立于杰基尔的存在形式，更发展出与创造者意志相悖的行为倾向。当系统具备复杂的具身能力后，如何确保其行为目标与人类价值保持一致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此，具身智能的发展不应仅仅以技术可行性为导向，更需要建立在对人类存在方式的深刻理解之上，否则就可能重蹈杰基尔博士的覆辙，在技术突破中丧失自我。

二、杰基尔的药剂：人工智能的权力重构

早在 19 世纪初期，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1818）便以哥特式的叙事揭示了科学对身体的创造与改造权力，预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话语的崛起。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维多利亚中后期（1850-1890）被历史学家称为“科学崇拜”时代（King, 2016, p. 440）。在 19 世纪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城市人口密集化与卫生条件恶化加速了天花、肺结核等疾病蔓延，人们逐步重视对疾病的医学防治。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初具规模，科学逐渐取代宗教成为新的权威体系，而药剂则成为这一权力的重要象征。在这一时期，医学从 18 世纪的经验主义迈向实验科学。医学和化学的进步使科学家能够通过药物干预身体机能，甚至重塑生命形式，正如弗兰肯斯坦用实验手段创造怪物一样，科学赋予人们改造的力量。药剂不仅是治疗工具，更是一种规训手段，体现了科学对身体的掌控——从麻醉剂的运用到公共卫生中的药物管理，科学话语通过药剂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重新定义了健康、疾病乃至人性的边界。这种科学崇拜既带来了进步的希望，也隐含着对科学滥用权力的深层焦虑。当人类试图僭越自然的界限时，可能面临无法预料的伦理与社会危机。维多利亚时代的药剂因此成为科学权威的缩影，既象征着理性与控制的胜利，也折射出对科学无限权力的不安与反思：“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既继承了对于生命科学的热忱，又害怕这种热忱所蕴含的力量”（Smith, 2016, p. 446）。

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认为，权力通过规训和控制身体来实现对社会的影响。自然身体是内在力量的容器，容易受到权力的各种操控：“身体成为新权力机制的目标，被提供给各种知识形式。它是被权威操控的、训练的身体”（Foucault, 1995, p. 155）。现代权力机制通过将身体客体化来实现控制，这种控制不仅发生在监狱、医院等制度空间，更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杰基尔博士的自我实验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反映了当时医学权力对身体的微观控制。医生通过专业化的知识体系重构了对身体的认知，将复杂的生命现象简化为可量化、可操控的医学对象：“医学凝视（Medical Gaze）重构了身体空间，将活生生的病痛经验转化为可分类的知识对象”（Foucault, 2003, p. xii）。身体成为医学知识的实验场，技术取代人性，个体身体被简化为医学审视的对象（Lindenbaum &

Lock, 1993, p. 90)。杰基尔博士的实验室正是这样一个权力运作的微观场域。通过药剂这一科学媒介，他将自己的身体转变为医学实验的对象，试图实现人格的分离与重构，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话语对身体日益增强的控制力。福柯的医学凝视机制，在此表现为科学理性对身体的量化管理与改造。杰基尔的实验通过化学手段对个体身体进行精确干预。药物被强加了人的意志，把杰基尔的身体改造成了无法改造的不协调混合体：“药剂本身是没有倾向性的，它既不属于魔鬼，也不属于天神”（斯蒂文森, 2015, p. 70）。杰基尔博士通过药剂改造身体，试图分离善恶人格，他自称药剂是“震震撼并抽紧肉体的外衣”（斯蒂文森, 2015, p. 67），而身体却是“烟雾一样的易变性”（斯蒂文森, 2015, p. 67）。在科学实验中，身体沦为科学实验的客体和目标，极易被摧毁：“拥有如此大的力量能够震动个性堡垒的药剂，稍一不慎，使用过量，或选择的时机只要有一点不合时宜，就会把我想加以改变的那烟雾似的肉体完全毁掉”（斯蒂文森, 2015, p. 67）。他将身体视为可随意改造的物质材料，揭示了身体的脆弱性与灵魂的主导地位。小说呈现了双重身体的辩证关系：杰基尔试图通过化学手段将身体客体化，以药物改造作为灵魂净化的途径，却最终被具身化的恶念所吞噬。当人类将自身身体视“可随意改的）体时，主体性反而会被这个造物所反噬。

小说构建了完整的技术权力失控的叙事。杰基尔最初仅将海德视为生活调剂的技术工具，这一动机恰与当代人工智能的工具性定位形成互文。技术工具可能超越其工具性本质。然而海德却最终反噬创造者，这一过程揭示了技术自主性可能带来的风险。实际上触及了技术发展中意图与后果之间的复杂关系，技术造物的自主性发展超出了创造者的预期，最终导致主体性反转。小说通过身体政治的寓言，折射出人类认知与科技发展速度失衡所导致的存在性危机。《化身博士》作为英国早期科幻小说的典范，通过杰基尔博士的悲剧性实验，深刻揭示了身体改造权力与科技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19世纪科幻小说中关于身体的未来寓言，“揭露的是人类认知无法跟上飞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而产生的崩溃与失衡”（李利敏、谭晨晖, 2024, p. 178）。这种失控不仅源于科学本身的局限性，更反映了人类在拥抱技术进步时对潜在风险的认知不足。杰基尔高估了理性的掌控力，却低估了非理性欲望的破坏性，其结果是个体在科技与道德的夹缝中陷入无法调和的分裂。小说以19世纪化学与医学为科学基础，预见了现代科技发展可能引发的身份危机与主体性困境。

这种身体改造权力在当代人工智能时代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如果说19世纪的医学规训主要通过药剂作用于身体，那么今天的算法和生物识别技术则构建了更为隐蔽的控制网络。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收集和分析身体数据，实现了福柯预言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on）的数字化升级。杰基尔博士的药剂与当代神经增强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形成了对照，它们都代表着科学对身体的介入权力，也都面临着技术失控的风险。人工智能正在重构规训权力，成为控制身体的新工具。药剂改变了杰基尔的身体，是一种权力的隐喻，人工智能算法也可以通过数据和行为分析，影响甚至控制人类的决策与行为。这

种技术反噬现象预示了当代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困境。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身体政治的运作机制发生了质的转变。算法监控和生物识别技术构建了新型的“数字身体政治”，其控制范围从物理身体扩展到数据化的身体表征。与杰基尔主动服用药剂不同，现代个体往往在无意识状态下就被纳入算法的规训网络。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在此演变为“算法社会”，但权力对身体的渗透本质并未改变，反而因技术的隐蔽性而更加深入。“全景敞视”监狱已演变为算法监控的社会化网络。当算法通过“生物识别数据”建构数字化的身体时，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解剖政治学”实践。斯蒂文森的“穿着衣服走来走去的，外表似乎挺结实的身體”（斯蒂文森, 2015, p. 67）所掩盖的身体的脆弱性，在算法社会中获得了新的诠释：数据化的身体表象之下，暗藏被技术权力穿透和控制的危机。杰基尔博士的药剂与今天的神经增强技术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它们都代表着福柯所警示的“生命权力”（biopower）对身体的渗透“权力通过网格化的策略来管理生命，不仅关注个体身体，更调控整个人口的生物过程”（Foucault, 1978, p. 139）。这种技术异化现象在当代技术中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人工智能通过“数据身体”的建构，实现了比维多利亚时代更为精密的生物政治控制。小说最后，杰基尔也有对科学实验对身体权力的伦理思考，对科学实验和技术对身体的改造的“度”和界限的反思：“如果我能用一种崇高的意愿来对待我自己的发明，如果我冒险以身试之的目的只是为了造福人类，一切情况就会不同，我也能从这些生和死的煎熬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天使，而不是一个恶魔了”（斯蒂文森, 2015, p. 69-70）。他试图通过化学手段分离人性的善恶，以“造福人类”为自己的实验辩护，却最终沦为自身技术的牺牲品，在善与恶的撕裂中走向毁灭。这一悲剧不仅展现了科学家在突破自然界限时的道德盲区，更折射出被滥用的科学权力对身体的僭越所带来的危险。主观的善意若缺乏客观约束，极易滑向危险的傲慢和自我毁灭。科学实验的正当性不能仅由研究者的意图决定，而必须接受社会伦理与法律规范的制约，否则技术便会从解放人类的工具异化为反噬人性的暴政。科学进步必须与伦理反思同步，设定技术权力的边界。

三、身体界限的消解：人机融合的焦虑

与《弗兰肯斯坦》中独立存在的造物不同，杰基尔与海德共享同一具身体，这种内在的共生关系导致了更为深刻的主体性危机。身体界限的模糊最终引发了身份认同的彻底崩溃，这一叙事逻辑为当代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隐喻性启示。小说中杰基尔试图通过科学手段分离人性中的善恶，却最终丧失对海德这一黑暗面的控制，象征着科技对自然人性的干预可能打破稳定的自我边界，导致身份认同的瓦解。小说深刻探讨了创造者与造物的镜像关系。海德并非外来的恶魔，而是杰基尔内心恶意的具象化投射，这一设定直指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伦理问题：技术产物终将成为人性本质的映照。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进步，自然身体与被人工改造的身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身体”的概念。当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人类身体时，人类的

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可能面临危机。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完全替代人类的某些身体功能，那么“人类”的本质是什么？杰基尔博士的变身过程模糊了身体的自然界限，挑战了人类身体的完整性与自主性。人工智能的发展模糊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挑战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的认知。《化身博士》中杰基尔服药后经历的身体变化和意识转换的变身过程，恰如当代人机融合的隐喻——技术不是简单地附加于身体，而是重构了我们的感知和存在方式。技术既是解药（弥补缺陷）也是毒药（导致异化），这种双重性在杰基尔身上表现为：化学增强既解放了被压抑的自我，又摧毁了完整的身份。人类本质或许不应被理解为某种固有属性，而是在与技术持续对话中形成的动态平衡。当人工智能开始模仿人类行为、情感甚至思维时，人类可能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我们是否还能清晰地区分自己与机器？人工智能是否会像海德一样，成为人类内心阴暗面的投射，进而扭曲人类的自我认知？杰基尔的悲剧根源在于将伦理考量置于科学实验之后，揭示了技术发展必须预设伦理容错机制。正如斯蒂文森通过律师厄特森这个旁观者角色建立的叙事距离，当代技术治理也需要保持必要的伦理审视距离，避免陷入杰基尔式的技术狂热。

杰基尔的科学实验将身体变为客体，最终导致主体被侵蚀。他逐渐沦为海德的奴隶，身体与心灵的分裂使他陷入无尽的痛苦，最终自我毁灭：“我的新的能力诱惑我，直到使我变成它的奴隶”（斯蒂文森, 2015, p. 70）。这反映了人类对科技失控的深层焦虑，尤其是当人工智能与人类身体融合时，带来的身份危机与伦理困境。当技术系统不仅具备感知和行动能力，还能通过机器学习不断进化其行为模式时，人与技术的关系就开始从主客体关系转向更为复杂的交互主体关系。这种转变既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也蕴含着深刻的风险。未来，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可能从“使用者与工具”转变为“共生伙伴”甚至是“协同者与主导者”。任何技术进步都必须以维护人的完整性和主体性为前提，技术伦理的建立需要先于技术突破本身。人类才能避免重蹈杰基尔博士的覆辙，实现技术与人文的良性共生。

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融合发展，传统身体的自然边界正在被技术重新定义”。杰基尔’士的变身寓言，在现代技术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解读空间。当人工智能可能深度介入甚至替代人类身体功能时，小说所警示的主体性危机显得尤为迫切。技术对身体的介入程度与伦理边界问题，成为当代科技哲学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化身博士》展现的技术异化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得了新的维度。当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日益模糊自然身体与技术增强的界限时，如何维护身体的完整性和主体性，成为亟待思考的伦理命题。《化身博士》的价值不在于提供解决方案，而是通过极端情境迫使我们直面这个永恒的困境：真正的危险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类对技术后果的想象力和责任感的匮乏。在这个意义上，保持适度的存在论焦虑，或许正是防止我们重蹈杰基尔覆辙的重要免疫机制。

结语

本文重读 19 世纪的小说《化身博士》，将小说中的身体问题隐喻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问题，重新挖掘小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意义。《化身博士》的文学想象与梅洛-庞蒂的具身理论和福柯的身体规训学说形成跨时空对话。小说中身体具身性被颠覆、被规训、主体性被侵蚀等问题映射出人工智能发展中会出现的类似问题。海德的畸形身体割裂了身心的统一，使得身体具身性被颠覆。杰基尔科学实验下的身体被客体化，隐喻了当代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将身体数据化并实施新型规训。从化学药剂到智能算法，技术规训权力完成了从显性干预到隐性控制的进化。杰基尔轻易改造身体，企图改造灵魂而忽视身体的主体性的后果是被灵魂反噬；轻视肉体的后果是沦为身体的奴隶。因此，小说揭示了两种对立：科技造物的身心分裂以及人类与其造物之间的主客体颠倒，这也是对未来身体技术的警示。正如杰基尔的悲剧所警示，身体改造不应该成为人类欲望的投射，科技与人性的关系应是共生而非单向控制。对人类生存的思考推动科技进步，而科技的每一次革新都应伴随着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反思和重构。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人类本质正是在与技术既合作又对抗的辩证过程中不断重塑的。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Foucault, M.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 Sheridan. Vintage Books.
- Foucault, M. (200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Routledge Classics.
-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 1), translated by R. Hurley. Pantheon Books.
- Hayles, N. K. (1999).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ing, A. M. (2016). "Victorian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Seashore." In J. Joh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Victorian Literary Culture* (pp. 438–45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denbaum, S., & Lock, M. (Eds.) (1993). *Knowledge, Power, and Practice: The Anthropolog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rleau-Ponty, M. (200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C. Smith. Routledge Classics.
- Pfeifer, R., & Bongard, J. (2007).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Way We Think: A New View of Intelligence*. The MIT Press.
- Smith, J. (2016). "The Victorian Novel and Science." In L. Rodensk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Victorian novel* (pp. 441–45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米歇尔·福柯（2003）：《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Michel Foucault (2003). *Abnormal: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4–1975*, translated by Qian Ha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李利敏、谭晨晖（2024）：“19世纪英国科幻文学中的身体推想与转型焦虑”，《认知诗学》(01): 169 - 179.

[Li Limin, Tan Chenhui (2024). "Specu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xiety of the Body in 19th-century British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Cognitive Poetics* (1): 169–179.]

罗伯特·斯蒂文森（2015）：《化身博士》，赵毅衡译。译林出版社。

[Robert Stevenson (2015).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translated by Zhao Yiheng. Yilin Press.]

张金凤（2019）：《身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Zhang Jinfeng (2019). *The Bod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